

人
學
家
名
自
選
集

张
自选集
灏

张
灏 ◎ 著 任 锋 ◎ 编校

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

转
幽
暗
意
识
与
转
型
时
代



自张
选集
灏

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

张灏 ◎ 著
任锋 ◎ 编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张灏自选集/张灏著；任

锋编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学人名家自选集)

ISBN 978-7-208-14962-5

I. ①转… II. ①张… ②任… III. ①思想史—中国
—近代—文集 IV. ①B25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2274 号

责任编辑 李 莹

封面设计 今亮后声工作室

学人名家自选集

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

——张灏自选集

张 灏 著

任 锋 编校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25.25

插 页 2

字 数 407,000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962-5/K · 2709

定 价 78.00 元

序

现代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曾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这句话在我多年来的历史论著中得到充分的印证。这些论著表面看来似乎庞杂无统序，但它们直接或间接都与我对时代的感受有密切的关系。

这份时代的感觉最初浮现是 1949 年我离开中国大陆的前夕。其时我十二岁，心智尚很幼稚，当然无法理解当时时局巨变的意义。但山雨欲来的气氛已开始浸入我的直觉，留下一些朦胧但强烈的印象。

那年春天，国共和谈破裂，中共大军直逼长江，南京城陷入一片混乱，学校也随之停课。就在停课那天，无事可做，我和几个朋友年少不知愁，随着一位同学到他家去玩。他的父亲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家就坐落在南京城北的高级住宅区，那儿都是一座座花园豪宅。使我吃惊的是，我们这一群大孩子居然能在他家及附近的深院大宅里穿梭式地随意来往奔跑，不但无人阻挡，而且也看不见一个人。当我向这位同学问起原因时，他淡淡地回答：“他们都跑了。”我这才猛然发觉，几天之内，南京已变成一座空城。一座空城？这是为什么？一种莫名的困惑与恐惧开始浮上心头。

不久我们也跑了，父母带着我去了上海。在上海短短的两个月，我借读位于市郊的上海中学。因为学校距离市区相当远，学生都是住校的寄宿生，只能在周末回家。记得每个周末我来往于市区与郊区之间，总看到军车穿梭不停，田野间到处都是士兵忙着建筑防御工事，一片四郊多垒、战祸临头的景象。学校有夜自修的制度。那些日子我每晚上罢初中部的夜自修，在回宿舍的途中，穿越校园，看

到高中生已经自动停止夜自修，大伙儿一群群的围坐在草地上，人影幢幢中，飘散着“团结就是力量”那首“进步”歌曲。歌声低沉而激越，气氛凝重而兴奋，远处依稀可辨的是田野间黑压压的碉堡，与不时传来的哨兵口令声。这些景象我完全不能理解，但本能地使我感觉一场大风暴就要来临。

随后我们去了台湾。那时的台湾正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政治气压极低，在我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对我的时代感受与政治意识难免有些压抑与扭曲的影响，但离开南京和上海前所留下的那些感觉与景象，却仍然不时地出没在我的脑际，在那里发酵，在那里潜滋暗长，像地下水一样灌溉着我的时代感。由于它的驱使，我进了台湾大学历史系。也由于它的牵引，我在校园里找到了殷海光先生，投入他的门下。大学毕业后我去了美国，海外辽阔的学术天地与思想视野，终于使我长年累积的时代感凝聚成多年来求学的中心问题：如何探索这时代大风暴的思想根源与背景？

近十年来，这探索留下了一些踪迹，就是这里搜集的文章。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讨论近现代思想与文化变迁的文字。特别是有关我所谓的“转型时代”（1895—1925）的论述，这不是偶然，因为长久以来，我认为转型时代是中国近现代大变动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

目 录

序 1

轴心时代

世界人文传统中的轴心时代 3
古典儒学与轴心时代的突破 20
重访轴心时代的思想突破：从史华慈教授的超越观念谈起 30

幽暗意识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43
幽暗意识的形成与反思 59
超越意识与幽暗意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之再认与反省 64
儒家经世理念的思想传统 87
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 105
政教一元还是政教二元？——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政教关系 125

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

转型时代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 151
思想的转变和改革运动(1890—1898) 163

一个划时代的运动——再认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	215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几点省思.....	225
转型时代中国乌托邦主义的兴起.....	236

五四与大革命

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	267
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	285
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	307
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	316

传统与现代化

传统与现代化——以传统批判现代化，以现代化批判传统.....	329
“民族的民主”——《梁聚五文集》序.....	342
一条没有走完的路——为纪念先师殷海光先生逝世两周年而作.....	347
殷海光与中国知识分子——纪念海光师逝世三十周年.....	353

附录

崔卫平：人最大的敌人是人自己——张灏访谈.....	359
陈建华：张灏教授访谈录.....	367
我的学思历程.....	379
回响与交流.....	395

轴心时代

世界人文传统中的轴心时代

众所周知，“轴心时代”(Axial Age, 800—200 B.C.)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提出的观念。他指出在那个时代，古代旧大陆的几个主要文明地区，西从东地中海，东至中国的华北，南至印度的恒河流域，都曾同时产生了思想与文化的突破。在他原来的构想中，中亚古波斯祆教(Zoroastrianism)的出现也是包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突破里，不过近年来学界对祆教是否开始于那个时代，已有怀疑与争议。但是即使把古波斯文明除外，我们仍然可以说，世界三个主要文明，西方中国与印度，在它们早期发展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轴心时代”的文化跃进。

这篇文章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对历来有关“轴心时代”的认识与研究，作一些大略的检讨，更重要的是：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对这个时代的历史意义提出一些个人初步的看法。

一、西方学界对“轴心时代”的看法

西方学界第一次注意到“轴心时代”这个历史现象是19世纪初叶。当时，法国的东方学家亚贝尔-雷慕沙(J.P. Abel-Remusat)已注意到公元前1000年间，在古代东西几个主要文明的区域里，大约同时发生空前的思想跃进^①。19世纪中

^① J.P. Abel-Remusat, “Memoire sur la vie Les opinions de Lao-Tseu”, *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VII (Paris, 1824), pp.1—54.

叶,德国学者拉索尔克斯(Lasaulx)在他的论著里已经把这个现象提升到历史哲学的层次去反思^①。

但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这个文化历史现象虽迭有讨论,到今天,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仍未给予这现象应有的重视,推究起来,大约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界的主流,承袭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一向是从西方中心的思想架构去看世界历史的发展,自然很难看到非西方地区(如中国与印度)的文化思想跃进有何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影响,韦伯(Max Weber)所代表的学术传承就是一个显著例子。众所周知,韦伯对非西方世界几个主要地区的文化发展,曾著有一系列比较文化研究,但是因为他的思想架构是建筑在西方文明特殊发展出来的理性观念上,他虽然对中国与印度传统文化都有专著,却并未重视这些文化在“轴心时代”所产生之思想突破的影响。

韦伯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传人,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20世纪50与60年代,也是以西方特有的理性化观念为出发点,把世界各种文化放在一个统一的演化架构内作比较研究。不错,他也曾提到公元前6世纪以后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圈内所发生的“哲学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但谈到古代文化发展的创新,他只认为古代西方的希腊与以色列是他所谓世界文明演化的“苗床社会”(seedbed societies),而中国与印度的古文明完全不在其列^②。韦伯与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是二次大战后在西方盛行的现代化观念的思想根源,可以说是现代西方学界的一条主流思想。这条主流思想在近年来,透过贝拉(Robert N. Bellah)对宗教进化(religious evolution)的论著,特别是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比较文化研究,开始正视“轴心时代”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意义,但他们对“轴心时代”的认识是否对西方学术主流产生影响,尚在未定之天^③。

这里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在西方学术主流之外,对“轴心时代”这观念也有一些反响,其中最重要的当数西方现代思想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巨著,《秩序与

① Karl Jaspers,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Zürich: Artemis Verlag, 1949), p.28.

② Talcott Parsons, *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6), pp.95—108.“哲学的突破”这观念见 Talcott Parsons,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by Max Weber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③ Robert N. Bellah, “Religions Evolution”, in *Beyond Belief, Essays on Religion in a Post-traditional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40), pp.32—33; Samuel N. Eisenstadt, *The Origins and Diversity of Axial Age Civilizations* (Albany, N.Y.: SUNY Press, 1986).

历史》(*Order and History*)^①。沃氏完全不同意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对“理性”这观念所作的狭隘理解,因此他在评价世界文化的发展时,可以对“轴心时代”作相当同情的了解,但问题是跳出了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的小框子,却跳不出西方文化的大框子。他的基本思想毕竟还是以古希腊与希伯来精神思想为本源,从这本源深处他吸收了一些对宇宙与生命的感受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以此为根据,他纵览世界文化的各主要发展,给予古印度与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所出现的思想跃进很高的评价,但最后就生命与历史的领悟深度而言,他仍不认为后者可以与古希腊与希伯来文化在同时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相提并论。

上面说到在西方学界主流内外对“轴心时代”这一论旨所产生的一些反响,但这些反响却经不起西方学界在近30年所涌现的一股强大思潮的冲击,这股思潮就是一般所泛称的后现代主义。这股思潮在两方面对“轴心时代”的讨论间接地产生负面影响。首先,后现代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否认主体意识对了解文化现象的重要性。而主体性的重要性正是“轴心时代”论旨的一个前提:这个时代的出现正由于当时的一些思想人物的主体意识产生了突破性变化,否认了这个前提自然使人无法看到“轴心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后现代思潮与“轴心时代”论旨都重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但后者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有高低发展之异,而前者则因为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而否认不同文化之间发展程度的高低差异性。二者在这方面观点的不同,自然使得“轴心时代”这观念在后现代的思想圈里没有引起兴趣。

上面的讨论不但使我们了解为何“轴心时代”的论旨迄今不能在西方学术界与知识界受到广泛重视,同时也可反衬今天重提这论旨的学术与文化意义。一方面它可帮助我们走出西方文化中心的思想框架去认识人类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认识“轴心时代”这个文化现象,我们也可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进而看到人类一些共有的经验在古代不同文化社区里形成内容迥异的思想跃进,而这些跃进为此后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前提,也因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① 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p.60; *The Ecumenic Age*, vol. 4 of *Order and Hist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2—4.

二、“轴心时代”的起因

探讨“轴心时代”这个历史文化现象，我们首先会问，为何这个现象发生在世界某些地区而不在其他地区出现？更重要的是：为何这个现象在古代几个主要文明地区同时出现？原因是什么？这发生缘起的探讨当然是重要而且饶富兴味的问题。西方学者从19世纪初叶开始认识这现象时，就曾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有些学者曾以文化传播(cultural diffusion)的看法作为答案。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文化现象先在一个地区出现，然后散布到其他地区^①。鉴于“轴心时代”的文化跃进，在不同的文明地区，以不同的文字形式与思想内容表现，这种文化散播的说法当然很难成立。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各文明的历史环境变动所造成的刺激与回应去解释“轴心时代”思想突破的出现。例如德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就曾指出公元前2000—公元前1000年间，印欧游牧民族从今日俄国南部向外移动，四处迁徙，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开始与当时几个主要文明地区接触而产生冲击。因此他认为这种人口大迁移所造成外在环境的刺激，足以解释为何印欧民族迁徙所至之处，当地人民受到震荡，对生命产生新问题与新思想，由此而有“轴心时代”的思想创新^②。

此外，欧洲学者魏尔(Eric Weil)也曾经从环境论的观点提出类似的解释。他指出“轴心时代”的思想突破都是在文明发生崩解的过程中产生。这不是偶然，因为文明的崩解代表当时人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而不满自然产生改变现状的希求，从而有突破的可能。因此他认为文明的崩解可以算作突破的一个必要条件^③。

这种环境的解释，失之过简，不能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就崩解导致突破这个解释而言，首先在事实层次上，就很有欠缺。不错，中国的轴心突破是出现于东周以封建宗法为基础的文明体系的崩溃过程中。就古印度的轴心突破而言，它是发

^① Eric, Voegelin, *The Ecumenic Age*, pp.3—4.

^② Karl Jaspers,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16; Alfred Weber, *Das Tragische und die Geschichte* (Hamburg: Govers, 1943).

^③ Eric Weil, “What is a Breakthrough in History?”, *Daedalus* 104, no. 2(Spring 1975), pp.21—36.

生于公元前 800—500 年。其时印度的社会经济结构是有些重要变化,但印度文明体系的整体并未进入分崩离析的状态。至于公元前 800—600 年发生于古以色列的轴心突破,以色列是当时西亚文明的边陲小国,随时都受着外来侵略的威胁,内部分为南北两个小王国,也不无政治的动荡,但大致而言,西亚文明体系的整体并未崩解。至于古希腊,至少到公元前 800 年就已明显变成城邦林立的文明,当轴心突破开始发生于公元前 500 年前后,希腊的文明体系并未处于分崩离析的过程中。因此,所谓崩解→突破之说,就事实而言,只是一些模糊影响之谈。同样重要的是:即使有文明崩解的事实,正如阿尔弗雷德·韦伯所指出的,古代人口大迁移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与破坏,这些都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但历史证明这些大规模的环境巨变在别的时候并不一定激发思想创新,例如公元 4 至 5 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之时,蛮族入侵,欧洲陷于分裂,并无思想突破、文化创新伴之而来,何以独在“轴心时代”有此结果?环境论对此没有回答。

持环境论的学者,有时针对“轴心时代”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立论,去解释当时的思想巨变。例如塔帕尔(Romila Thapar)在解释印度“轴心时代”佛教的兴起时,就曾特别强调公元前 1000 年以印度恒河流域发生了古印度史上所谓的“第二次城市化”现象(second urbanization)。这现象带来了空前的经济变化,如铁的应用、马的饲养、犁耕农业的出现以及市场经济相应的发展,连带新政治与社会组织的演化,这些所形成的历史环境的剧变,自然给人以世事无常的感觉。这就是佛教的基本观念之所由起。因此,他认为就佛教的兴起而论,印度“轴心时代”的思想文化突破是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变迁找到原因^①。

这种环境的解释也失之于太简化,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印度的“轴心时代”,除了佛教的兴起,尚有古婆罗门教的《奥义书》(Upanishads)的出现,而后者的思想与前者有着相当不同,何以同样的社会经济环境可以出现不同的思想?再者,中国的“轴心时代”是晚周,众所周知,晚周也出现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巨变,与印度“轴心时代”出现的“第二次城市”现象很类似,而晚周出现的思想变化与当时印度的思想变化内容迥异。二者在这方面的迥异,配上社会经济环境的相同发展,又将如何解释?对这些问题,环境论都难以作答。可见就“轴心时代”思想变化的成因而言,环境论的解释是有很大限制。

^① Romila Thapar, "Ethics, Religion, and Social Protest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in Northern India", *Daedalus* 104, no. 2 (Spring 1975): pp.119—130.

近年来德国学者罗哲海(Heiner Roetz)研究儒家伦理与“轴心时代”的关系,应用西方心理学家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提出的个人认知发展模式去解释文化总体的发展,后者认为个人一生的认知发展大约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所谓的前习惯期(pre-conventional):相当于人的童年期,对事物的反应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他的行为完全取决于这个行为是否会给他带来一时的满足与快感。第二阶段是习惯期(conventional):是指一般人在青少年成长的时代,渐渐知道自己的行为必需符合外在社会的习俗规范,在日常活动上要使社会一般人“高兴”。第三阶段是所谓的后习惯期(post-conventional):在这一阶段,人渐渐知道行为是可以自己自由决定,特别是开始知道个人行为应该取决于普遍抽象的道德理念,而这理念是基于个人内在自主的良知^①。

罗哲海的观点是:这种个人认知发展的模式也可以宏观地应用于解释文化总体的递嬗演变。就中国的文化发展而言,“轴心时代”是相应于个人认知发展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后习惯期^②。罗哲海这种理论漏洞甚多,最明显的是把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内容过于简化,才能勉强将之塞入所谓的后习惯期。此处更要紧的是:罗哲海虽未明说,但他应用柯尔伯格的理论去解释文化发展,似乎蕴涵一种文化进化论的看法,也就是说,人类文明有一个共同演化的趋势,当这演化进展到某种程度以后,“轴心时代”的出现是自然的结果。这种演化论,如果是指世界文化普遍的趋势,则其缺点是很显然的,因为“轴心时代”,不但在世界许多文化区域里没有出现,即使在一些主要的古文明地区,如埃及与西亚两河流域,也未见其踪影。如果此演化论是根据少数“轴心时代”曾经出现过的文化经验的归纳,视这些文化为三阶段演化的看法仍然很难成立,因为就我们对古代文明演进的认识,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与中国等地区在“轴心时代”出现以前,都是神灵信仰笼罩的时代,其文化发展的模式与柯尔伯格所看到的个人认知在前习惯期与习惯期的发展模式相距甚远,不可轻易比拟。因此罗哲海从文化进化论去解释“轴心时代”的出现也是很难成立的。

总之“轴心时代”这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发生的缘起因果,迄今找不到满意的解释,仍是充满神秘的谜团,而且根据我们现在可能掌握的历史资料与诠释架构,至少在可及见的未来,这个“为什么?”的问题似乎还很难有完满的解答。

^① Heiner Roetz, *Confucian Ethics of the Axial Age* (Albany, N. Y.: SUNY Press, 1993), pp.26—32.

^② Ibid., pp.26—32, 265—280.

三、“轴心时代”的思想特征

今天关于“轴心时代”的研究,根据现存的历史文献以及其他文化资料,比较可以作具体探讨的问题是:“轴心时代”有哪些共同的思想特征?这些特征对后世人类文化的发展有何影响?关于前面这个问题,最令人注意的是西方两位学者,艾森斯塔特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提出的看法^①。他们在探讨“轴心时代”的共同特征时,都强调超越意识出现的重要性。他们都重视超越意识在人的思想上所形成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与紧张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度批判意识与反思性。但是我觉得这种看法太宽泛,仅仅强调超越意识的出现尚不足以真正彰显“轴心时代”的特征。因为超越意识的出现并不完全限于“轴心时代”,至少就中国古代而言,如果我们以“天”的信仰为超越意识的标志,则远在中国的“轴心时代”以前的殷周之际与西周初年就有超越意识出现。此外,古希伯来以耶和华一神信仰为代表的超越意识的首次出现,很可能要追溯到公元前 1200 年以前的摩西(Moses)先知时代,因此也远较“轴心时代”的上限——公元前 800 年为早。因此,我认为想要认识“轴心时代”的思想特征,不能只限于超越意识,而需要进一步看到由超越意识衍生的原人意识,后者才是“轴心时代”真正的思想创新。

什么是“超越的原人意识”?所谓“超越”是指在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终极的真实,后者不一定意味否定现实世界的真实,但至少代表在价值上有一凌驾其上的领域。在“轴心时代”这超越意识有一内化于个人生命的趋势,以此内化为根据去认识与反思生命的意义,这就是我所谓的“超越的原人意识”。

诚然,对人的生命作反思,并不始于“轴心时代”,远在这时代以前的西亚两河流域的文化里就出现一些神话,特别是有名的吉尔伽美什(Gilgamesh)诗篇与阿达帕(Adapa)故事,都反映对人的生命与死亡有所反思^②。古埃及文明里面也有一些文献,如公元前 1500 年左右的《死亡书》(*Book of the Dead*)以及更早的“金

^①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Age of Transcendence”, *Daedalus* 104, no. 2 (Spring 1975); pp.1—7; Samuel N. Eisenstadt, *The Origins and Diversity of Axial Age Civilizations*, pp.1—4.

^② 关于 Adapa 神话,见 Alexander Heidel, *The Babylonian Genesis*, 2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p.147—153; 关于 Gilgamesh 史诗与 Enumaelish 神话,见同书; 关于后的分析,见 Henri A. Frankfort et al., *The Intellectual Adventure of Ancient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p.168—183。

字塔文”(Pyramid Texts)与“棺材文”(Coffin Texts)也含有对生命的道德意识与死亡的意义探究^①。古希腊在“轴心时代”以前产生的荷马史诗,也对人的性格与道德行为有些省思^②。但这些反思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意识与批判意识都只是枝节的或灵光一现的,因此与“轴心时代”的“超越的原人意识”有着不同层次的悬隔。后者是透过超越的内化,发现生命有内在的精神本质,由此得以奠定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认同,并进而对生命的本质与本原作一根源式的体认,从此把人类文化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也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种“超越的原人意识”(以下简称原人意识)在各个古文明的“轴心时代”有着不同发展,也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古希腊,这出现的过程是逐步的演化。一方面从荷马史诗中所展现的人间性很强的神祇世界,经过苏格拉底以前哲学思想中超越意识的萌芽,终于在苏格拉底所开启的希腊古典哲学里,神的观念以超越的形式出现,同时由荷马史诗经过希腊悲剧思想与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思想发展,以及神秘宗教如俄耳甫斯(Orphism)的影响,到古典哲学思想问世,个人内心的心灵与灵魂(psyche, nous)观念终于与超越意识结合而形成超越内化的思想趋向。在这思想趋向主导下,希腊古典哲学视生命为道德精神的提升、一条德性追求的历程^③。

“轴心时代”的希伯来文化也有类似的发展,首先是由公元前 13 世纪的摩西

^① Eric Voegelin, “Egypt”, chap. 3 in *Israel and Revelation*, vol. 1 of *Order and Hist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52—110.

^② Bruno Snell, “Homeric View of Man”, in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d: The Greek Origins of European Thought*, trans. T.G. Rosenmey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0), pp.1—22.

^③ 古希腊文化与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在观念上常常受到一种限制,那就是认为古希腊文化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源头,而所谓理性,在西方近代以科学为主导的文化影响之下,主要是指科学与世俗理性。因此,古希腊文化的理性主义也常常顺着现代科学理性的思路被解读,而受到过于简化的曲解。不错,古希腊文化里面有科学理性的源头,但它的理性观念很复杂,并不限于此。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现代西方学界出现了一系列的专著,特别是 Werner Jaeger 与 Bruno Snell 的巨著,已经对于过于“现代化”的古希腊研究作了重要的修正,把古希腊文化里面的所谓“非理性”的成分,特别是宗教与精神层面,作了重要的澄清和彰显,因此今天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的理性主义里面,超越意识有着关键性的地位。见 Werner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3 vo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1944), 与 *The Theology of the Early Greek Philosophers*, trans, Edward S.Robins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7) 与 Bruno Snell,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d: The Greek Origins of European Thought*; Eric R.Dodds,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Eric Voegelin, *The World of the Polis*, vol. 2 of *Order and History: Plato and Aristotle*, vol. 3 of *Order and Hist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7).